



首页 → 学术文章 → 经济伦理

余达准：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等经济伦理思想的批判与继承

摘要 马克思经济伦理思想有着英、法古典经济学、德国古典哲学、空想社会主义以及同时代经济学的思想渊源，通过分析和批判，马克思在诸如经济伦理的视角、方法以及劳动、异化、拜物教、自由、平等概念与范畴，不同时代经济伦理的主体特征等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关键词 古典经济学 德国古典哲学 空想社会主义 经济伦理 马克思

—

古典经济学是马克思经济伦理思想的一个重要思想来源，马克思指出：斯密的《国富论》标志着“政治经济学已发展为某种整体，它所包括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形成”[1](p181)。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是为新兴资产阶级确立自己的统治服务的，它的社会功能就在于论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合理性和永恒性，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寻求伦理原则和建立伦理秩序。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至少在以下方面引起马克思的关注或使马克思受到启迪。

其一，古典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是人，这个“人”在经济伦理上的原理或涵义正如斯蒂格勒在《经济学家和说教者》中所说，“斯密在他该成功的地方取得了成功，首先是在人的行为方面提供了一个几乎具有无限威力的原理，他创造了在竞争环境中追求自己利益的个人，这个创造就其普遍性而言可以与牛顿的创造媲美。”[2](p78)这一创造或假设肇由斯密，正是斯密第一次把个人谋求自身利益的动机和行为系统清晰地纳入经济学的分析之中，并经典性地对经济人的行为如何导致整个社会丰裕的经济伦理机制进行了经济学的证明。换句话说，他第一次把最初以道德哲学问题形式出现的利己与社会利益之间的关系系统地转化为经济学的伟大主题。李嘉图虽然将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抽象化，但他同意经济人的基本假设。马克思深受古典经济学的影响，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里，曾经开宗明义地指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是“在社会中进行着生产的个人，——因而，这些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自然是出发点。”[3](p86)但是，马克思不赞成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在他看来，经济人是虚妄的，因为经济人伦理内涵的前提私有制本身就不是天经地义的，马克思说，“国民经济学把社会交往的异化形式作为本质的和最初的形式，作为同人的本性相适应的形式确定下来了。”[4](p25)社会的经济伦理秩序也不是仅由自利而至整体利益和谐这么一条，更何况自利观是维护私有制的写照，并非是无产阶级的道德操守。马克思首先考虑的是社会经济制度的合理性，他的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必然超越古典经济学，他的经济伦理思想要在看似纯粹经济学概念的推理与演绎中展示，因而那种过于伦理化的假设必然被他所摒弃。

其二，古典经济学确立并分析了重要的概念，这些概念不仅包括直接具有经济伦理学意义的自由、竞争、公平、正义等，也包括一般经济学概念，如资本、价值等等，古典经济学还形成较成熟的劳动价值学说。马克思对自由、公平、正义等作出了新的诠释，他认为自由、正义、平等等的经济伦理含义并不在于这些名词的抽象形式上，而在于它所对应的生产关系的属性上，没有形式背后所隐含的社会生产关系的规定性，就不能展示社会公平、正义或自由的真正内涵。马克思在经济学研究中，更关注古典经济学设立的价值、资本等概念和劳动价值学说。价值这一概念在经济学说史上虽然出现较早，但把劳动看作价值的源泉，以生产商品所消耗的劳动时间来衡量价值，这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大成果。威廉·配第第一次提出了劳动价值论的基本观点，他认为“劳动是财富之父和能动因素，土地是财富之母。”[5](p66)休谟在《人性论》中也说过，“世界一切事物均由劳动所购得。”[6](p179)詹姆斯·斯图亚特提出了实际价值的概念，他指出实际价值决定于一个劳动者在一定时间内平均能够完成的劳动量，尽管他的实际价值的概念十分混乱，但正如马克思所说：“斯图亚特比他的前辈和后辈杰出的地方，在于他清楚地划分了表现在交换价值中的特殊社会劳动和获取使用价值的实在劳动之间的区别。”[7](p48)亚当·斯密进一步推进了劳动价值论，他在《国富论》中，从各种劳动形式中抽象出一般劳动，认为投入任何一个生产部门的劳动都是财富的源泉。他明确区分

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强调商品的交换价值的根源是劳动，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斯密已经认识到了商品的交换实际上是凝结在商品中的劳动量的交换。但斯密的价值理论是不彻底的、混乱的，工资决定商品价值的意见常与劳动时间决定价值的意见混在一起，且彼此相互矛盾。李嘉图既继承了斯密的价值理论，又克服了它的混乱和矛盾。他在《政治经济学与赋税原理》一书中比较正确地阐明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关系，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商品的价值仍决定于耗费的劳动时间，并对此理论作了透彻的表述和发挥。[8](p55)但是，正如马克思所说：“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缺点之一，是从来没有从商品的分析，特别是商品价值的分析，成功地发现那使价值成为交换价值的价值形态。甚至亚当·斯密和李嘉图，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优秀代表，也把价值形态当作毫无关系、和商品本身的性质没什么联系的东西来看。他们会如此看，不仅因为价值量的分析已经完全吸引了他们的注意；还有更为深刻的理由。劳动产品的价值形态，不仅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最抽象的形态，并且也是它的最一般的形态。它把这个生产方式当作一种特别的社会生产而加上印记，同时还使它取得历史的特征。如果人们错误地把这种生产方式看作是社会生产的永恒的自然形式，人们就必然会把价值形态的独特性忽视掉，因此也把商品形态的独特性，把更进一步发展的货币形态，资本形态等等的独特性都忽视掉。”[9](p980)

通过对资产阶级学者劳动价值论学说的梳理，马克思确立了自己的劳动价值学说。[10](p282-285)虽然资产阶级学者不会用劳动价值论建立为无产阶级服务的经济伦理体系和伦理原则，但马克思会。他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已敏锐地觉察到，在“价值”概念研究中，“有必要对唯心主义的叙述方法作一纠正，这种叙述方法造成一种假像，似乎探讨的只是一些概念的规定和这些概念的辩证法。”[11](p97)因此，马克思在价值理论研究中，首先从价格的现象形态中揭示出价值的本质，从交换价值的外在形态中揭示出价值的内容；并在阐明价值是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的基础上，明确了使用价值和价值都是商品这一物质存在和社会产物的两个因素。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生产交换价值的过去是抽象一般的和相同的劳动，而生产使用价值的劳动是具体的和特殊的劳动。”[7](p24)最后，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系统地阐述了劳动二重性学说。马克思十分珍重自己的这一理论创见，他认为，“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这种二重性，是首先由我批判地证明了的。”[12](p331)而且，还是他政治经济学理论中“最好的地方”。[13](p202)由于劳动二重性理论的提出，使“劳动创造价值”这一古老命题从此有了崭新的含义。“劳动创造价值”已精确为抽象劳动创造价值；而且，在社会商品再生产过程中，进一步精确为抽象劳动创造新价值和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并转移所消耗的生产资料中的旧价值这样两重性。这样，长期以来困扰劳动价值论发展的理论障碍已被排除，劳动二重性成了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成了马克思剖析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最重要的理论武器之一。

马克思对于劳动价值理论的继承，还表现在提出了“商品拜物教”的理论。马克思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对“商品拜物教”的性质和实质，作了深入的阐释。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了“商品拜物教”产生的现实根源和理论根源：“经济学家们把人们的社会生产关系和受这些关系支配的物所获得的规定性看作物的自然属性，这种粗俗的唯物主义是一种同样粗俗的唯心主义，甚至是一种拜物教，它把社会生产关系作为物的内在规定归之于物，从而使物神秘化。”[14](p202)然而，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中，商品拜物教取得了它的最高形式——资本拜物教。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考察了货币拜物教之后，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就进一步指出了资本拜物教的实质。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社会劳动的生产力和社会劳动的特殊形式，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和形式，即物化劳动的，劳动的物的条件（它们作为这种独立的要素，人格化为资本家，同活劳动相对立）的生产力和形式。这里，我们又遇到关系的颠倒，我们在考察货币时，已经把这种关系颠倒的表现称为拜物教。”[15](p36)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理论彻底克服了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价值理论中非社会性和非历史性的致命弱点，揭示价值的社会性和历史性。马克思对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转化序列的分析，揭示了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物化的外在化关系的实质，表明“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它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特有的社会性质。”[16](p920)

其三，古典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关系进行了经济分析，提出了符合资产阶级利益和伦理要求的效率原则、分配原则和秩序原则，马克思曾在致约·魏德迈的信中指出：“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17](p332)这里指的就是英国古典经济学家。斯密第一次比较正确地描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他认为一国土地和劳动的全部年产物的价值，分解为土地地租、劳动工资和资本利润三部分，与此相适应，以地租收入为生的地主、以工资收入为生的工人，以利润为生的资本家，构成资本主义社会三个主要基本阶级。这里斯密第一次把资本家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阶级提了出来，并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资本家和工人在经济利益上的对立，这是对阶级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李嘉图在探讨工资、利润、地租的分配形式时，比斯密更彻底。他把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当作自己研究的出发点，揭示了利润与工资的反比例关系，揭示依靠地租为生的地主阶级同整个社会利益的对立及其经济根源。法国古典经济学的完成者西斯蒙第从生产和

消费的矛盾中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他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的矛盾以雇佣劳动和资本的存在为前提，而这两者的存在及其发展意味着社会阶级的两极分化。西斯蒙第是第一个明确提出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社会阶级两极分化和无产阶级形成的经济伦理学家。他指出：工业化的结果是“中产阶级完全消灭了。社会中，除了大资本家和其雇佣外，没有其它阶级存在的余地。我们看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阶级——完全没有财产的阶级迅速成长。” [18] (p124)

马克思遵循了古典经济学的这条研究路径，通过阶级分析法，展露了不同阶级的经济伦理原则、规范 and 在不同社会制度中的作用，同时，马克思也指出古典经济学对阶级关系进行经济学分析的不彻底性、虚伪性，认为古典政治经济学几乎接触到事物的真实状况，但是没有自觉地把它表述出来，只要古典政治经济学附着在资产阶级的皮上，它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资产阶级迫切需要为资本主义剥削制度进行辩护的理论。“现在的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不偏不倚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丐的争斗，公正无私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 [12] (p17) 马克思揭示出古典主义经济伦理思想终究是为统治者的利益服务。它的自由竞争、自由放任的伦理信条造成的后果就是社会两极分化。

除了对古典政治经济学价值理论合理因素的吸收和引申外，马克思还批判了马尔萨斯、萨伊、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巴斯夏等人的庸俗观点。虽然马尔萨斯将人口问题同社会学、经济伦理学相结合，影响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但是马尔萨斯将劳动的价值等同于工资，这是错误的。萨伊提出商品的价值由效用决定，这一在西方经济思想家看来创造性的观点被马克思斥之为“陈腐的浅薄”见解，这些批判对于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生产的秘密、揭穿资产阶级经济伦理的虚伪性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

马克思对十六至十八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经济伦理思想进行了科学分析，他在赞扬了空想社会主义者的革命热情后，又指出：“随着这些早期的无产阶级运动而出现的革命文献，就其内容来说，必然是反动的。这种文献倡导普遍的禁欲主义和粗陋的平均主义。” [19] (p281) 对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的思想体系，马克思称之为：“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19] (p283) 是“本来意义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体系。” [19] (p281) 从伦理思想史的角度来说，各种空想社会主义体系，都对马克思经济伦理思想的形成发生了影响。恩格斯在讲到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的理论和贡献时说：“虽然这三位思想家的学说含有十分虚幻和空想的性质，但他们终究是属于一切时代最伟大的智士之列的，他们天才地预示了我们现在已经科学地证明了其正确性的无数真理。” [20] (p566)

空想社会主义的经济伦理对马克思的经济伦理思想影响主要在于两点，一是空想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批判，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 [19] (p232) 但是马克思的批判不同于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批判，对于粗陋的共产主义，马克思指出他们追求的是私有财产的普遍化和平均化，他们用普遍的私有财产来反对资本主义私有财产，所以，他们“不仅没有超越私有财产的水平，甚至从来没有达到私有财产的水平。” [21] (p72) 他们的极端平均化的要求，实际上是对整个文化和文明世界的抽象否定，是向贫穷的、没有需求的人的非自然的单纯倒退。与空想共产主义不同，马克思用历史主义的态度肯定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作用。他说，“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经济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 [19] (p232) 然而，私有制的历史作用并不能掩盖它的伦理关系的实质，即资本运动所揭示的剥削本质。只有揭示这一本质，才能对私有制进行真正的批判。二是空想社会主义者对未来社会的社会主义设想；空想社会主义者提出的新型社会经济伦理秩序，生产组织原则、分配原则和经济伦理理想给马克思留下深刻的印象。如前所述，圣西门以他的“实业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组织，实业制度的唯一长远的目的，是运用科学、艺术和工艺的知识来满足人们的需要。在不取消私有制的前提下，人人都应当劳动，个人的收入同他的才能和贡献成正比。傅立叶设想了一种能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情欲得到充分满足的“和谐制度”。欧文的设想更为激进，他设想的“新和谐公社”理想社会，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共产主义劳动公社的联合体。实行财产公有，在劳动公社中，不再有资产者和无产者的差别，劳动公社按需要分配。欧文不仅设想了他的理想社会，而且在欧洲和美洲进行了社会主义的实验。这些运动及思想财富对于马克思构想未来社会的自由人联合体和共产主义按劳分配、按需分配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8] (p64)

三

马克思的经济伦理思想不仅是对古典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的经济伦理思想的批判与继承，还是在批判西斯蒙第以及魏特林、卡尔·海因岑、蒲鲁东等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经济伦理思想的斗争中发展完善的。马克思在《剩余价值学说史》中说，“资产阶级的生产，由于它本身的内在规律，一方面不得不这样发展生产力，就好像它不是在一个有限的社会基础上的生产，另一方面又毕竟只能在这种局限性的范围内发展生产力，——这种情况是危机的最深刻、最隐秘的原因，是资产阶级生产中种种尖锐矛盾的最深刻、最隐秘的原因，中产阶级的生产就是在这些矛盾中运动，这些矛盾，即使粗略地看，也表明资产阶级生产只是历史的过渡形式。……这一点被例如西斯蒙第粗浅地但又相当正确地看成是为生产的生产同因此而排除了的生产率的绝对发展的分配之间的矛盾。” [22](p86-87) 1847年马克思发表《哲学的贫困》，对蒲鲁东的经济伦理思想进行了猛烈批判。首先马克思批判了蒲鲁东经济伦理观立论的唯心主义哲学基础，蒲鲁东受黑格尔的影响，把规律、原理以及抽象的自由、平等范畴看作是理性产物，是独立于现实经济关系之外的。马克思说：“既然我们忽略了生产关系（范畴只是它在理论上的表现）的历史发展，既然我们只希望在这些范畴中看到观念、不依赖实际关系而自生的思想，那末，我们就只得到纯理性的运动中去找寻这些思想的来历了。” [17](p140)其次，针对蒲鲁东将自由竞争的经济伦理观奉为圭臬、并用竞争是人类本性加以论证的思想，马克思批驳道，竞争并非不可消除，关键在于消除产生竞争的社会条件。竞争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而不是出自人的本性，相反，人的本性却是由它们的整个生活方式所决定的。因此，马克思说：“蒲鲁东先生不知道，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 [17](p174)第三，马克思批判了蒲鲁东的平等理论。蒲鲁东将平等视为经济伦理的最高假设，最高的幸福，而分工、信用、工厂等一切经济关系仅仅是为了平等的利益才被发明的。在蒲鲁东看来，一切现实的经济关系都是由于实现经济范畴的好的方面即平等才存在的，把一切经济关系归结为一种平等的道德要求。平等成了天命，成了蒲鲁东范畴推演的手段，总之成了历史的动力。马克思反驳这种观点，指出平等的趋势是本世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代替了封建生产方式之后才出现的。平等，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代之以封建经济关系的结果，而不是相反。马克思指出：“平等趋势是我们这个世纪所特有的。但是，说以往各世纪及其完全不同的需求、生产资料等等都是为实现平等而遵照天命行事，这首先就是把我们这个世纪的人和生产资料当做过去世纪的人和生产资料看待，否认世代代不断改变前代所获得的成果的历史运动。” [17](p153)因此，平等决不是好或坏、善或恶的问题，而是封建时代的人和生产资料历史运动的结果。马克思对蒲鲁东的批判，始终表现出在经济伦理问题上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

四

马克思从德国古典哲学和德国经济学中也批判继承了许多经济伦理思想。康德对于自由和自由意志的论述，黑格尔、费尔巴哈、鲍威尔对劳动异化的看法，都深刻影响了马克思思想的形成。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当中，马克思就说，“在康德那里，我们又发现了以现实的阶级利益为基础的法国自由主义在德国所采取的特有形式。不管是康德或德国市民（康德是他们的利益的粉饰者），都没有觉察到资产阶级的这些理论思想是以物质利益和由物质生产关系所决定的意志为基础的。因此，康德把这种理论的表达与它所表达的利益割裂开来，并把法国资产阶级意志的有物质动机的规定变为‘自由意志’、自在和自为的意志、人类意志的纯粹自我规定，从而就把这种意志变成纯粹思想上的概念规定和道德假设。” [23](p213)这实际上批判了康德将人们之间的伦理关系与物质利益相脱节。马克思在1843年发表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说：“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十八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 [3](p64)这就是说，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的分析与批判，得出结论：物质生活关系是理解市民社会，进而理解包括国家和法的关系、伦理关系等在内的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出发点。在《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文中，马克思指出本国经济学家李斯特的思想实质是通过国家干预、保护关税等政策，发展民族经济；但马克思并未肯定李斯特的观点，指出他建立在中立性的生产力概念之上的政治经济学，似乎要摆脱别人对“同胞进行剥削”，实际上是他们自己的打着某种幌子的利益集团对自己同胞的“更加厉害”的剥削。 [4](p250) 马克思没有被李斯特发展生产力的理论表象所蒙蔽，他说：“谈论自由的、人的、社会的劳动，谈论没有私有财产的劳动，是一种最大的误解。” [4](p254)马克思意识到，在李斯特那里，看到的是连同资产阶级私欲一起发展的生产力，而非劳动者的真正发展的生产力。不过，李斯特的精神生产力的理论给了马克思很大启示。

费尔巴哈和鲍威尔对宗教的批判和异化的观点，给马克思以深刻的影响，马克思对经济主体的伦理分析因之找到了理论参照系。费尔巴哈指出宗教不过是人的本质的异化的另一种形式和存在方式，“上帝之中也存在着人的精神的概念或观念。” [24](p314)鲍威尔同意把这种异化看成基于人性的想象，“但是他并不象费尔巴哈那样认为宗教信仰仅仅是人类本质的一个投影，因而只要人把他创造的对象重新收回给自己就行了。” [25](p66)鲍威尔的观点要前进一

步，既然人的状况是扭曲的，因而人的思想、人的愿望、人的上帝也都是扭曲的；还原到人还不足以消除异化、罪恶。鲍威尔循着黑格尔的路径，把宗教看作是意识的一种分裂，他认为异化不是外在的，而是“自我异化”(Selbstentfremdung)。他写道：“自我现在成了一切，但又完全是空虚的；它成了一种普遍力量，但又处在世界废墟之上，勉力对付自身的惊恐，为自己的失败而悲叹；这个空虚的自我，尽管吸收了一切，但并没有足够的勇气把自己看成是一种普遍力量，也就是说，它依然属于宗教精神范畴，而且通过发挥它那种与自身相对立的普遍力量的作用来完成异化，把普遍力量看作是要以恐慌来对待的生疏的、异己的力量，以使它们能为自己的存在和赎罪起作用。自我把耶稣看作这种存在的保证，因为耶稣代表了实际上是自我本身所具有的那些属性；认为普遍的力量是这样一种力量，它不仅包含一切自然观，而且对道德精神、大众精神、国家生活和各种艺术见解也能从道义上进行区分。” [26](p309-310)鲍威尔将异化同政治历史紧密结合起来，这启发了马克思从劳动和经济关系中考察异化。此外，鲍威尔关于异化及异化的消除是区分人类社会历史阶段标准的思想，对于马克思用异化劳动及其扬弃来划分经济主体的阶段特征，有明显的启发作用。

On Marx's ethical critique all of classical economics, classical philosophy of Germany, fancied and mixed socialism

Abstract: The economic ethics ideology of Karl Marx was influenced not only by classical economics of England and France, but also influenced by classical philosophy of Germany, fancied socialism and mixed socialism, such as the perspective and method of economic ethics, manual labour, dissimilation, fetishism and so on.. Marx has criticized as well as inherited all of them.

Key words: classical economics, classical philosophy of Germany, fancied socialism, economic ethics, Karl Marx

注释：

-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6卷(II)，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2] 引自杨春学.经济人与社会秩序分析[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
-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 [5] (英)威廉·配第.赋税论 献给英明之士 货币略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
- [6] 引自(美)斯皮格尔.经济思想的成长[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1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 [8] 庄福龄主编.马克思主义史[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 [9] 参阅马克思.资本论[M].第1卷第1章注1，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 [10] 吴易风等.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形成与发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 [12] 马克思.资本论[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6卷(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4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 [1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C].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18] (瑞士)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论丛[C].》第2卷，巴黎,1838.
- [1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C].》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2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1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 [21]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刘丕坤译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 [2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6卷(III)，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2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 [24] 费尔巴哈哲学史著作选[M].(第1卷)，涂纪亮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 [25] (英)麦克莱伦.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 [26] (德)鲍威尔.复类福音作者批判[M].第3卷，德文版.资料来源：刘永佶.马克思经济学手稿的方法论[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



中国社会科学院应用伦理研究中心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邮政编码：100732 电话与传真：0086-10-85195511

电子信箱：casethics@yahoo.com.cn